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二)

中国航海学会, 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黄展岳

摩尼教在泉州

摩尼教在中世纪曾广播于亚洲、欧洲和北非，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约在4世纪后期传入中国，起初在民间流传，影响不大。唐武后延载元年（694），摩尼教得到官方承认，从此流行开来，唐人据其音译，称其为摩尼教。是时，摩尼教已成为回鹘国教，传教的摩尼师都是中亚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安史之乱以后，他们倚仗回鹘助唐平叛之威势，在中国内地大力推广摩尼教，先在两京一带，随后广布于江南，在长江中下游的荆（沙市）、扬（扬州）、洪（南昌）、越（宁波）等地建寺经商。唐武宗废佛，殃及摩尼，不久，废佛中止，摩尼教又恢复活动。五代北宋以后，人们往往据其教义多以“明教”或“明尊教”称之。这时摩尼教的活动范围也由中原转向东南沿海，而以福建的福州、泉州，浙江的温州、台州、明州等地最为盛行。由于泉州至今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尼教遗址，保存的有关摩尼教遗物也较多，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故撰此小文，供与会学者讨论参考。

一 摩尼教何时传入泉州

泉州之有摩尼教，在南唐徐铉《稽神录》卷三中已有记载：

清源人杨某，有大第在西郊，鬼出没四隅，杖莫能中；乃诏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惧而去。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遂绝。

这条史料证明，至迟在五代，泉州已有摩尼教活动，是时已称“明教”。而具体谈到摩尼教传入泉州的时间及其传播路线则推明代泉州学者何乔远《闽书》所载最为详实。该书卷七《方域志》云：

会昌（841—845）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

由此知摩尼教入泉州殆在会昌废佛之后，摩尼教徒呼禄法师由中原逃难入闽，先到福州、福清传教，随后又到泉州，死后葬于“郡北山下”。吴文良先生因南宋朱熹有《与诸同僚谒奠北山》呼禄法师墓的诗，并据传闻，推定呼禄法师墓应在清源老君山下。先生生前曾多次到老君山下搜寻，惜无所获。^①

有些学者根据福州地方志书，进一步提出在会昌废佛以前，福建已有摩尼教活动的看法。例证之一是宋梁克家《三山志》记侯官神光寺于唐大历三年（768）析南涧为金光明寺，大历七年（772）改为大云光明寺，“会昌例废”。这座在“会昌例废”的大云光明寺，很可能是摩尼教寺院。据北宋释赞宁《僧史录》、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及《通鉴》卷二三七胡注，大历三年唐朝只准许回鹘人在长安修建一座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又准许他们在江淮的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说明“大云光明寺”是摩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45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尼教寺的专用名称。由此推定，侯官的金光明寺及后改名的大云光明寺应是摩尼教寺。^①例证之二是唐林嵩《太姥山记》云，“太姥山顶有一摩尼宫”。此“摩尼”虽然也可为佛家用语，但与道德之“宫”结合者，故此宫为摩尼教寺院的可能性较大。《太姥山记》的作者林嵩，唐末文人，他未提此宫建造时间，可见该宫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武宗时不可能建此宫，它只可能建于武宗在位（841—846）前。^②

上述论证如果可以成立，则可证明，在会昌灭佛以前，福建已出现福州大云光明寺和太姥山摩尼宫等摩尼教寺院。呼禄法师于会昌灭佛时逃亡福建，“授侣三山”，说不定曾在大云光明寺驻锡。随后他又“游方泉郡”，看来当时泉州已存在为呼禄法师提供传教和长期居住的摩尼教寺院。从泉州在唐末时的历史地位以及上引《稽神录》、《闽书》叙说的语气看，说泉州在唐武宗以前可能已有摩尼教徒活动，绝非无稽之谈。我们期待新资料的发现。

二 宋元时期的泉州摩尼教

五代宋元时期，摩尼教活动中心由中原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摩尼教徒与国外中亚摩尼教团已失去联系，存在于中国内地和活动于东南沿海的教徒分化为两种形式：一种流布于下层社会，与民间秘密社团或秘密宗教相结合，成为农民反抗运动用以组织民众的工具；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摩尼教，往往受到统治者的禁止以至残酷镇压，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引人注目，但

① 连立昌：《明教性质刍议》，《福建论坛》1988年3期。

② 林悟殊：《记摩尼教在福建的传播》，转引自廉亚明《中国东南摩尼教的踪迹》，《海交史研史》2001年第2期第72、73页。

遗迹遗物难于保存。另一种是以道化或佛化的寺院生活为形式，继承唐代摩尼教的寺院制度，与世无争，在寺院中自我修炼摩尼之法。这种形式的摩尼教，没有或很少受到统治者的干预^①，至今尚有少数遗迹遗物可供研究。

根据泉州现存的历史文献，遗迹遗物以及宋元时代的泉州历史地位等多方面考察，泉州摩尼教的主要活动应是佛化的寺院生活，教徒众多，安分守己，受地方政府的管领保护。为了比较完整地表达这种看法，有必要先回顾一下 20 世纪 50 年代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的确认和元代管领明教景教碑的发现。

关于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最早见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志文云：

泉州府晋江县华表山，与灵源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

这条史料，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引起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注意并征引，随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著文论证，而遗址的确认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经吴文良先生实地调查并著文考订，由是晋江草庵摩尼寺之名大显于世，中外学者纷纷著文、考察，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学者确认这座摩尼寺始建于元代，崖壁上的摩尼佛像刻于元至元五年（1339）。从摩尼光佛圆龕两侧题记“善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等内容，可知信徒均为附近乡间百姓，他（她）们把摩尼佛混同于释迦牟尼佛，以佛教徒的虔诚心态来供奉。

元管领明教秦教碑，1954 年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碑上有汉文和古叙利亚文各两行。汉文碑文曰：

^① 林梧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 166 页，台北淑馨出版社 1997 年版。

管领江南诸道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第一行)

皇庆二年(1313)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第二行)

第一行，秦教即景教，或称聂斯托尔教，基督教之一派别。也里可温，乃元代基督教派各派之总名，意为拜上帝者。陈垣先生早已考证。^①其他字句，中外学者考释者甚多，比较全面透彻的是英籍学者刘南强先生。他说：马里哈昔牙为叙利亚语 Mari Hasia 的汉语音译，原为圣者或主教的一个普通称号，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是墓主人的名字；阿必思古八，意为主教。整句解读是：

献给江南诸路的摩尼教和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景教主教马里·失里门。^②

摩尼教本是回鹘国教，后来回鹘人改奉景教，是知马里·失里门原是摩尼教徒，后来又信仰景教，所以元朝让他管领江南诸路的摩尼教和景教。这块墓碑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元代东南沿海各地的摩尼教是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的。但正如林悟殊同志指出的，这里指的是东南沿海的寺院式摩尼教，而非民间秘密结社形式的那种摩尼教。元代寺院式摩尼教的地位高于宋代，而且显

^① 《元也里可温教考》，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第3~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刘南强(S. N. C. Lieu)：《华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林悟殊译)，《海交史研究》1987年2期，第95、96页。又见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江淮摩尼教》，《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2期。

得更为独立自主。在宋代，寺院式摩尼教要依托佛教，更依托道教，作为道教的一宗而合法存在；而在元代，寺院式摩尼教除了依托佛道以外，还作为一个独立的外来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受到政府承认，否则，皇庆二年的碑文就不会把它和秦教并列。^①

20世纪80年代前后，泉州文博部门在草庵前发掘出带有“明教会”字样的宋代瓷碗，继而又在晋江县图书馆发现清嘉庆十三年泉州学者蔡永蒹《西山杂志》抄本。这两项发现，对深化泉州摩尼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据黄世春同志介绍，1979年他在草庵前20米处发掘出“明教会”黑釉瓷碗一件及同类瓷片60多片（其中13片带有残存的“明”、“教”、“会”字样）。为寻找这批瓷器的烧制地点，他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在磁灶大树威发现了这批瓷器的烧制窑址，其烧制年代约在两宋之际^②。宋代“明教会”瓷器的成批发现，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年，这里已出现摩尼教寺院，是当时泉州摩尼教的一个活动地点。从成批烧制专用食具可以窥见，当时这里必定有众多的教徒，过着平静的山林寺院生活。

几乎与发现“明教会”宋瓷碗同时，在晋江县图书馆发现蔡永蒹《西山杂志》抄本。抄本“草庵寺”条云：

宋绍兴十八年（1148），宋宗室赵紫阳在石刀山之麓筑龙泉书院，夜中常见院后石壁五彩光华，于是僧人吉祥募资琢佛容而建之寺，曰摩尼寺。元大德时（1297—1307），邱明瑜曾航舟至湖，格登摩尼寺，捐修石亭，称曰“草庵寺”。

① 见上揭林悟殊书，第174～176页。

② 黄世春：《福建晋江草庵发现“明教会”黑釉碗》，《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据泉州市文管会陈鹏鹏同志面告，他曾多次审视这批黑釉碗，其烧制年代大约在北宋末至南宋初期。

明正统乙丑十年(1445)修。明洪天馨先生与吴象坤先后隐居于此。尔后佛会僧人谓摩尼非牟尼,遂置之荒芜也,而龙泉庵则被清兵所毁。

首先引用这条材料的是庄为玘先生。^①林悟殊先生转引这条材料时,未审石刀山即华表山,致误认泉州有两座摩尼寺,一座在石刀山(据《西山杂志》),另一座在华表山(据《闽书》)。^②对此结论,他似存疑惑,在注释中引述李玉昆曾谓“该本(指《西山杂志》抄本——引者)系后人传抄,材料并不可靠”,但他没有采纳,仅在末尾说“此亦一说,可供研究者参考”^③。我没有看到蔡氏原写本,仅在会议期间从李玉昆处借到该书誊抄本,匆匆浏览,初步认为,李玉昆同志指摘抄本系后人传抄,材料并不可靠,当有所据;举《西山杂志》所言之石刀山摩尼寺即华表山之草庵,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指摘“后人传抄”含义欠清晰,是后人冒名蔡永蒹的道听途说之作,还是后人对蔡本有所窜改、添补?这些都应逐条逐段甄别审定,亦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辅黄图》、《西京杂记》等古籍均被后人窜改添补,经校勘甄别,仍不失其史料价值。对待《西山杂志》亦应抱这个态度。仅就这条引文看,前后行文似有脱佚,不像是一人一时所写,前半段(开头至“草庵寺”)可能是蔡本原文,值得重视。这段文字揭示:南宋绍兴十八年,宋宗室赵紫阳在华表山建龙泉书院以前,这里已有摩尼教徒活动,因在书院后面的石壁上发现“五彩光华”,于是僧人吉祥募资在石壁上雕塑摩尼光佛,建寺,曰摩尼寺。及至元大德年间,邱明瑜在寺旁增修石亭,改称摩尼

① 庄为玘:《泉州摩尼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②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67页。

③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78页注⑧。

寺为草庵寺。今庵前发现的“明教会”瓷碗，应是宋代摩尼寺僧众的专用食具。1938年弘一法师驻锡草庵，撰书《重兴草庵记》，首言“草庵肇兴，盖在宋代”，当有所本，或即据《西山杂志》而言。在这次会议间及会议后，我两次到草庵考察，南宋僧人募资雕琢的摩尼佛及创建的摩尼寺，已荡然不存；元大德间邱明瑜捐修的石亭和兴化姚兴祖奉舍的石室（据佛龕外左上方题记）也不复存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摩尼佛雕像，从佛龕外右上方题记（字迹已漫漶不清），可确认为元至元五年谢店信士陈真泽捐奉，屋宇构筑大体保存弘一法师驻锡时旧貌。真相如何，建议组织专业人员实地考察再作判断。

宋代传入泉州的明教来自唐代中原摩尼教，还是另从海路传入？至今未达共识，这是学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持海路传入的学者，主要论据有三条。1. 宋代泉州是世界贸易港，各色人种汇集，带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其他宗教文化，其中不可能没有摩尼教徒。2. 据宋绍兴间闽人庄季裕《鸡肋篇》卷上云：“事魔食菜，法禁至严，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联系闽浙沿海发现多起摩尼教遗迹遗物，推测宋时摩尼教自海上传入泉州继续北传至莆田、福州、温州，遂及二浙。3.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 2139 条：元祐六年（1091）“殿中侍御史杨畏言：‘近日布衣薛鸿渐、林明发以妖妄文字上闻。诏送两浙福建路转运司根治。臣闻鸿渐教本自海上异域，入于中国，已数十年，而近者益炽。’”此处言薛鸿渐之教由海上传入，究为何教，虽不明确，但从当时情势推测，摩尼教的可能性不小。”^① 持宋代泉州明教来自中原摩尼教的学者，可推

① 主要参考庄为玘：《古刺桐港》，第 303、304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竺沙雅章：《吃菜事魔について》，《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东京，1974 年；林文明：《摩尼教和草庵遗迹》，《海交史研究》创刊号，1978 年。

林悟殊为代表,主要论据也可归纳为三条。1. 宋代福建明教源自唐代中原摩尼教,何乔远《闽书》言之甚详。2. 宋代明教比唐代摩尼教更加华化,唐季把中亚摩尼教团逐出中国,从此,中国摩尼教徒只在汉人中自行传播。3. 西亚、中东摩尼教徒随阿拉伯商人到泉州,并按照自己的宗教习惯生活是可能的,但定居与传教是两回事。西亚摩尼教实行近亲通婚习俗,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很难想像来泉定居的西亚摩尼教徒能在泉州传教。^①

我拜读了双方学者的部分论著,反复琢磨,依违莫决,主要的感觉是,双方的论据材料都是间接的,都未能提出直接的无懈可击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看法的准确。值得欣慰的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持第一种看法的庄为玘先生说:“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待以后深入研究。”^②持第二种看法的林悟殊同志也说:“并不排斥当时有西方摩尼教徒由海路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活动的可能性。”^③审度宋代明教性质及当时泉州的历史地位,可否作这样推测:宋代泉州明教徒主要源自唐代中原摩尼教的传承而更加华化;在汹涌来泉通商传教的外国人中,也有西方摩尼教徒随同来泉经商定居,为了适应泉州民俗,他们和陈江丁氏、清源金氏、泉郡郭氏的阿拉伯先辈一样,逐渐融合于泉州社会,成为外裔泉州人,成为华化明教徒,他们中间的少数人,还可能成为传播明教的法师。我的这些推测,目前也还缺乏实证,但我有信心期待新资料的发现。

① 主要参考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1~155页。李玉昆:《福建晋江草庵摩尼教遗迹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2期。又《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见庄为玘:《古刺桐港》,第304页。

③ 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53页。

三 泉州摩尼教的归宿

从全国范围看，摩尼教到明代已呈全面衰落消失，但在个别地方，却仍显现其顽强的生命力，晋江草庵便是最耀眼的一处。庵前摩崖上有明正统乙丑年（1445）镌刻的“清净光明 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 摩尼光佛”十六个大字。这十六个字，是表达摩尼教“四位一体”教义的专用术语。“劝念”这十六个字，就像佛教劝念“南无阿弥陀佛”和“南无观世音菩萨”一样。^① 1988年，在莆田发现与草庵同样内容的碑刻，时代在元末明初。^② 说明直到明代，摩尼教教徒仍在泉州莆田一带公开宣扬摩尼教教旨，在寺院中过着自我修炼的山林生活。

到了清代，摩尼教（明教）已不见于官方记载，但仍有余绪可寻。上引《西山杂志》后半段（“明正统”以下）颇疑为后人在蔡本上增补。蔡本成于嘉庆十三年（1808），后人增补似在19世纪下半叶。“明正统乙丑十年修”，似是草庵摩崖石刻“正统乙丑年九月”的误抄，上下文似有脱佚。从末尾“尔后佛会僧人谓摩尼非牟尼，遂置之荒芜也，而龙泉庵则被清兵所毁”的文意看，草庵被“佛会僧人”废弃的时间应在清代；“龙泉庵”的前身是龙泉书院，书院变庵堂的时间似在明末清初。草庵荒芜多长时间，有待查考。所幸在荒芜期间，寺内石壁上的摩尼光佛雕像和庵前摩崖上的石刻安然无恙，这是值得称道的奇迹。草庵至迟在20世纪20年代，又以新的寺容面世了。据1938年弘一法师《重兴草庵记》云：

① 参看林梧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2～32页。又《福建发现的波斯摩尼教遗物》，《故宫文物》1994年1期。

② 陈长城：《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海交史研究》1998年2期。

中华建业十二载(1923),瑞意广空上人伤其废圮,发意重兴,绵历岁时,营治堂宇。壬申(1932)十月,复建意空楼三楹,虽未循复旧观,亦可粗具规范^①。

从大师撰写的碑文看,重建的草庵已变成佛教寺院,主持重建的瑞意广空上人优礼异教主摩尼,与本教佛祖一视同仁,一起供奉;对庵前的十六字摩尼教义,仍妥善保存,表现了对异教的宽容。在寺庙林立、神祇众多、信仰失控的泉州,已消亡的摩尼教竟因这两件遗物而获得生机。泉州百姓把这位华化的摩尼教教主融入到泉州众神的行列中,让他接受善男信女们的供奉崇拜。据吴文良、林悟殊等学者的实地调查,草庵至今香火不绝、庵内举行的一切宗教活动完全按照当地佛教或地方神庙的仪式,驻庵女住持及女徒弟,按闽南佛教寺院的特殊风习称为“菜(斋)姑”。她们称摩尼光佛为“摩尼公”,既尊奉“摩尼公”,又尊奉“观音菩萨”,平时在“摩尼公”前念《金刚经》,重要节日,延请和尚、道士协同念经。更有趣的是,“泉俗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日(其实是纪念观音菩萨的诞辰)是农历二月十九日,而今南门外纪念摩尼光佛诞辰却是农历四月十六日”^②。这一天,当地百姓要为虚拟的摩尼光佛诞辰举行隆重的宗教活动,说明昔日摩尼教的影响并没有被遗忘。不同的是,摩尼原是一位世界性宗教的教主,而今竟被异化,降为泉州南门外的一位神祇,虽有

^① 弘一法师《重兴草庵记》今仍镶嵌在草庵墙壁上。

^② 参看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44页。林文明调查稍有不同,他说,观音生日是六月十九日,摩尼生日是六月十三日。参见《摩尼教和摩尼遗迹》,《海交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林悟殊调查见《故宫文物》1994年1期。其实还有很多学者到过草庵考察。新编《晋江市志》,把草庵列入佛教寺院庵堂一览表。在“摩尼教”条云:“近年庵前的佛教龙泉寺重建后,改为大华岩寺。晋江摩尼教被当地百姓奉为佛教。”见该书第1319、133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屈尊”之嫌，亦幸运之至矣。现在晋江摩尼光佛已成为消亡的摩尼教之仅存实物，当地纪念摩尼的民间信仰活动在国内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